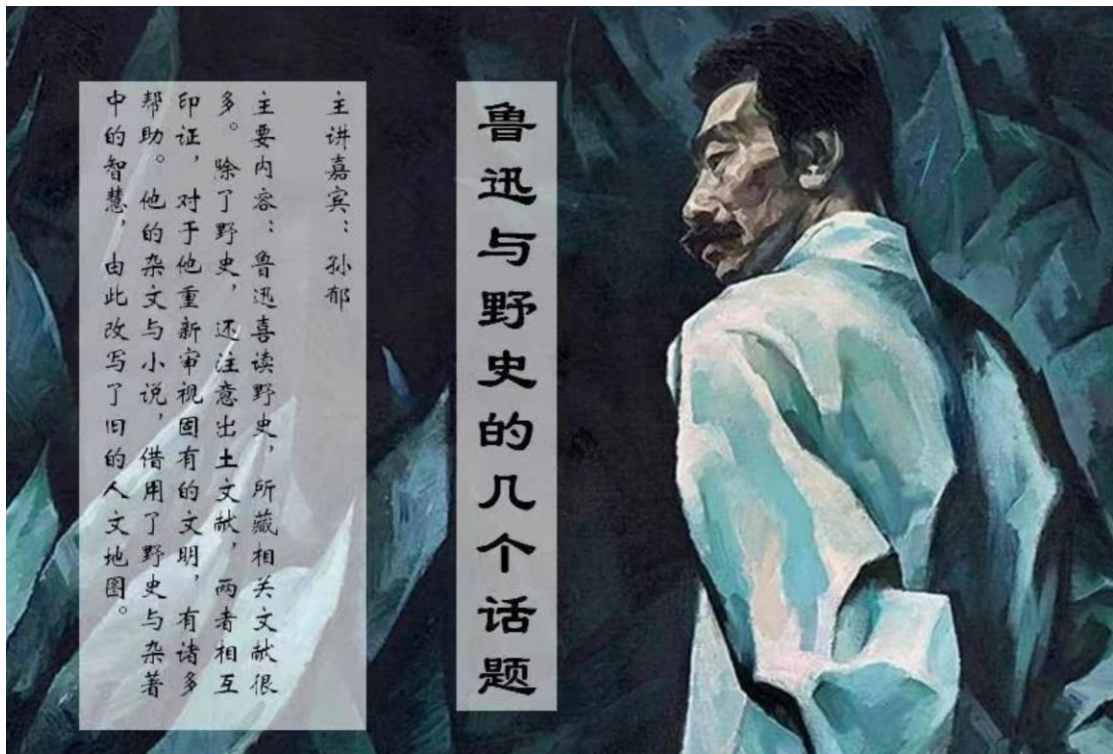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孙郁：鲁迅与野史的几个话题

2023年4月22日，中关村教育基金会和迅鲁文化传媒（北京）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“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系列讲座——鲁迅与野史的几个话题”在鲁迅书店进行，主讲嘉宾为孙郁老师。孙郁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，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，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，曾担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。主要著作有《鲁迅忧思录》、《鲁迅与周作人》、《鲁迅与胡适》、《鲁迅与陈独秀》等。



1988年硕士毕业后，孙郁开始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，因从小建立的对鲁迅的感情，他去了编辑内部刊物《鲁迅研究动态》，随机开

启了伴随一生的鲁迅研究。很多人对鲁迅贴上了“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”的标签，而孙郁认为，“鲁迅逝世后，不同阶层对鲁迅的描述不同。从革命立场、民族解放、新文化建设的立场上看，鲁迅称得上是这‘三家’，但任何结论都不可能把一个人完全概括，都是走近一部分。其实，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塑造鲁迅，他的日常生活，大家了解的少。他的精神生活，往往符号化，世俗社会之外的符号，变成了一个标签。”



鲁迅重视历史典籍，对于野史笔记更为留意。他说过，读史，“尤其是宋朝明朝史，而且尤须是野史；或者看杂说。”野史是对“正史”而言。正史是统治阶级官方修定的史书，清乾隆时选定从《史记》至《明史》等二十四部史书作为《正史》。野史指的是中国古代私人编撰的史书；杂说即杂记，往往记一时之见闻和一事之始末，或者常有掌

故性质的史书。



鲁迅并非一开始接触就能自觉地把“正史”和“野史”区分开来，并重视“野史”的。他之所以在后来的思想发展中，把“正史”与“野史”区分开来，并且愈来愈重视“野史”，一方面固然是受了“新史学”的影响，但另一方面则更是受了五四时期“平民主义”思潮的影响。五四时期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，中国国内文化思想界兴起了一股“平民主义”思潮，李大钊连续发表了影响广泛的《庶民的胜利》、《Bolshevism 的胜利》；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 1918 年 11 月 15-16 日天安门举行的庆祝协约国胜利的大会上发表演说，认为协约国的胜利是“武断主义（专制主义）的末日，平民主义的新纪元”，并喊出了“劳工神圣”的口号。此后其他

许多人都发表了提倡“平民主义”、“劳工神圣”的文章，“平民主义”汇为高潮。文学界提出了“平民文学”口号（最有影响的是周作人的《平民文学》一文），史学界也提出了“平民史学”的口号，当时就有野史是“出于民众”的说法。在鲁迅著作中，“野史”一词最早见于《读经与读史》一文，他并且正式地把“野史”与“正史”区分开来，他说，倘要读旧书，“倒不如去读史，尤其是宋朝明朝史，而且尤须是野史；或者看杂说”。他在该文中又说，“‘官修’而加以‘钦定’的正史”，“不但本纪咧，列传咧，要摆‘史架子’；里面也不敢说什么”。此后，在鲁迅的著作中，野史与正史便区分得清清楚楚，谈及野史的文章也日见其多。



鲁迅欣赏魏晋文化，除了源于早期的读书经验外，也受到了晚清

新的审美思潮的影响。章太炎、刘师培对于魏晋文化的理解，打破了韩愈古文运动以来的文章理念，在桐城派遗产以外寻找精神资源，曾经启示了诸多学人。不过鲁迅与他们略有不同，除了小学功底外，有着考古的心得。他不仅勘察旧迹，还抄录、整理大量的原始文献，有着一般人没有的批判眼光。他的工作可分以下几类：一是乡土资料，主要有《会稽郡故书杂集》、《会稽先贤著述辑存》、《会稽旧志》、《会稽旧志草本》，内中有方志所遗漏的内容；二是文人作品集，现存有其抄录的《嵇康集》、《法显传》、《谢灵运集》等，作品有着不凡的辞章；三是古小说资料整理，代表性的有《小说备校》、《古小说钩沉》，志怪、录异、志人之作丰富；四是金石类，此类抄件甚多，主要有《直隶现存汉魏六朝石刻录》、《六朝造像目录》、《六朝墓名目录》等，其间不乏意外之思。这些对于鲁迅理解文学产生的背景，提供了有趣的参照。



鲁迅的思想作为一个过程，依然可以给今天每一个人带来启发。因为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鲁迅作品的时候，有那么多享受与趣味，有那么多变与不变的东西。在孙郁先生的坚守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个丰富的鲁迅，一个用世俗语言无法描述的鲁迅。

